

# 描寫語言學的興起及其發展\*

王 力

描寫語言學又稱靜態語言學，這是對某一具體語言的靜態描寫，而不管它的歷史演變。按照這個定義，揚雄的《方言》也可以認為是描寫語言學，但是《方言》只限於部分詞匯的零星記錄，人們還不能從此看見當時語言的全貌，特別是語音方面缺乏敘述。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語音情況；但是作者不是從語言學觀點，而是從詞曲學觀點來看問題。清初樊騰鳳的《五方元音》記錄了十七世紀北京的語音系統<sup>①</sup>。黃謙的《滙音妙悟》(1800)記錄了十八世紀福建泉州的語音系統；像這類的書不算太少，但是記錄的人不是經過語言學訓練的人，甚至不是經過等韻學訓練的人（如《五方元音》以“風羊”切“方”），而且他們的書也只是爲了掃盲的目的，不是爲了語言學的目的。因此，真正描寫語言學的產生，是在普通語言學傳入中國以後。

中國學者們之所以一向不重視描寫語言學，是受了復古主義的影響。小學是經學的附庸，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像顧亭林那樣夢想着：“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但是，清儒對於唐韻也認爲非正，哪裏還甘心研究清代的語音呢？章炳麟等人之所以研究方言，無非想證明方言中存在着一些“古”的東西，那仍然是歷史語言學觀點，不是描寫語言學觀點。直到普通語言學傳到了中國，學者們的眼光才有了轉變，能對現代語言進行靜態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嶄新的一套。譬如說，記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舊法了，而是利用音標了。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由於趙元任、李方桂等人的提倡，曾經有一個時期把力量完全放在方言調查上。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也逐漸有人在做了。

在此以前，有些外國傳教士也曾爲了傳教的目的，甚至爲了侵畧的目的，調查過我國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他們多數沒有經過嚴格的語言學訓練，他們的著作，可信程度是不高的。高本漢自己所調查的方言，可信程度較高，但是偏於黃河流域；即以黃河流域而論，他只調查了幾處，也還是不夠的。

\* 編者案：本文是王力教授《中國語言學史》第四章第十八節。

① 樊騰鳳是堯山（今河北隆堯縣）人，但是他所記的當是北京音。

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是中國描寫語言學的較早的重要著作。他實地調查了江蘇浙江兩省的三十三處的方言。他的調查以語音為主, 同時還調查了三十七處七十五個詞的詞匯, 二十二處五十六用的助語詞。此外還附錄了“北風跟太陽”的故事。

語音部分分爲四章: (一) 吳語聲母; (二) 吳語韻母; (三) 吳語聲調; (四) 聲韻調總討論。前三章所列的聲母表、韻母表、聲調表, 主要是表現了《廣韻》、“國音”(按指普通話)、吳音三方面的對應, 特別着重在古音系統與現代吳音系統的對應。表中以“國音”排在吳語三十三處方言的上面, 而聲、韻、調都按照下面的三個標準來分類:

(1) 今吳音聲母, 今吳音韻母, 今吳音聲調類, 這一欄又分爲兩行: 第一行是吳音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行是吳音的最小公倍數。

(2) 古母, 《廣韻》韻, 古四聲。古母依照三十六字母的名稱, 但照穿床審各分二類。《廣韻》依照 206 韻; 古四聲也依《廣韻》。

(3) 分合條件。例如見母今開合爲  $\kappa$ , 今齊撮爲  $t\phi$ ; 魚虞兩韻  $l$  母與  $tz$  系在蘇州爲  $i$ ;  $g$ ,  $n$  系在蘇州爲  $y-$ ;  $\eta_1$  系在蘇州爲  $u_2$ 。古上聲清上在蘇州爲陰上, 濁上如果是次濁文言, 則變陰上或陽去, 其餘一律讀成陽去。

其次, 在每一類都舉了一些例字。每一表後面都有詳細的討論, 最後還來一個聲韻調總討論。

這種做法, 是比較富於科學性的。特別是分合條件一欄很重要, 有了這一欄, 才能說明語音演變的規律性。後來人們所作的方言調查報告, 雖然不再標明“分合條件”, 但是凡是拿《廣韻》的音系來對比的, 都注意到古今音的對應規律。這書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現代吳語的研究》出版後, 對後來的方言調查起了很大的影響。《廣韻》對比的辦法一直到解放前沒有人改變過, 甚至“北風跟太陽”的故事也被廣泛應用着(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與趙氏自己的《鍾祥方言記》都用了)。

趙元任的第二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南京音系》(科學雜誌 13 卷八期) 第三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中山方音》。

趙元任第四部調查方言的著作是《鍾祥方言記》(1936 年寫成, 1939 年出版)<sup>②</sup>。這書分爲三章: 第一章是語音的分析, 記錄了鍾祥方言的十七個聲母、三十六個韻母和四個聲調, 並加以描寫性的說明; 第二章是本地音韻, 分析了聲母跟韻母的關係(主要是聲母跟四呼的關係), 介母跟韻母的關係, 聲母跟聲調的關係, 聲母、韻母、聲調間的關係, 還有單音字全表和同音字匯; 第三章是比較音韻, 先是跟國音比較, 其次是跟廣韻比較。《鍾祥方言記》比起《現代吳語的研究》來, 在方法上有了明顯的進步。第一,

<sup>②</sup> 趙氏在序裏說: “鍾祥居湖北的正中心, 方言是西南官話之一種; 比武漢派的湖北話又多帶一點普通化的色彩。現在給鍾祥語言作一個較詳細的記錄跟分析, 差不多就是把中國中省中部的代表語言記下來了。”

著者把“語音”和“音韻”分開了：“語音”只是客觀的描寫，“音韻”則是聲、韻、調相互間的關係；第二，著者拿前兩章來作純粹靜態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歷史<sup>③</sup>。這樣，描寫語言學的性質就較濃厚。

羅常培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廈門音系》（1931）和《臨川音系》（1936）。《廈門音系》的特點是故事多，字表多。總的說來嫌繁了一點。《臨川音系》第一章是敘論；第二章是語音的分析，第三章是本地的音韻；第四章是比較的音韻；第五章是特殊詞匯；第六章是標音舉例。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完全是《鍾祥方言記》的架子<sup>④</sup>。但是羅氏的治學態度是謹嚴的，其中也有不少創造性。例如《臨川音系》聲調的分析利用了實驗語音學；講本地音韻時，先撰《臨川韻鏡》，再談《臨川方音的通性》，也能別開生面。

董同龢關於方言調查的著作有《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1948）（《集刊》第十九本81—210頁）。此書的特點是以記錄成段的話為主，頗有參考的價值。

前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共進行了六次方言調查。已經發表的只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這是第六次調查的報告，調查時間是1936年，直到1948年方才出版。這是一次相當大規模的方言調查，參加者是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總共有64個調查點，每一點都寫一個報告，所以篇幅很大。最後還有一綜合報告。在綜合報告中，有：（甲）綜合材料；（乙）湖北特點及概況；（丙）湖北方言地圖。其中以方言地圖最為重要，這是中國的第一部有方言地圖的著作。

解放前的方言調查，有兩個共同的缺點。第一是側重在語音方面，對詞匯、語法重視不夠；第二是夾雜着歷史語言學的東西，不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這兩點可以說是受了高本漢《方言字典》的影響。高本漢爲了研究古音，他那樣做是對的；我們調查方言不是爲了研究古音（至少不是主要目的），就不一定要拿古音來比較，徒然塗上一層復古主義色彩。歷史語言學味道最濃的是《現代吳語的研究》和《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因爲沒有什麼地方純然是靜態描寫的；其次是《廈門音系》，書中雖有描寫語音學的獨立章節，但是仍然着重在跟《廣韻》對比，而且沒有跟“國音”對比，顯得厚古薄今。在《鍾祥方言記》與《臨川音系》裏，歷史語言學的味道雖然沖淡了，對於《廣韻》仍然不捨得割愛<sup>⑤</sup>。實際上，完全不提及《廣韻》也可以進行很有科學價值的方言研究工作，最近（1960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爲昌黎縣誌所編的《昌黎方言誌》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言調查需要很多的準備工作。前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進行方言調查之前，先準備了一個調查用字表，人們不需要調查幾萬字的讀音，只消調查一

③ 只有《同音字匯》中列有《廣韻》一欄，但是並不按照分合條件。

④ 趙元任在《鍾祥方言記》的序裏說：“……或者可以給人做一個其他方言記錄的樣本吧。”羅書顯然是受了趙書的影響。

⑤ 白蔭洲遺著《關中方音調查報告》（1933年調查，1954年由喻世長整理出版）值得在這裏提一提。此稿似乎是純粹的描寫語言學；書中第七章“關中方音與古音的比較”是整理者寫的。

些有代表性的字，就可以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趙元任等在進行湖北方言調查時，所用的調查用字表包括678個單字。選字的標準當然從音系出發；而音系又跟《廣韻》有關。在今天我們雖然不需要人人熟悉《廣韻》才進行方言調查，但是準備調查用字表的人則必須熟悉《廣韻》。這又是辯證的着法：搞描寫語言學的人在著作中應該盡可能不涉及歷史語言學，但是他們必須具備歷史語言學的知識，然後描寫語言學才搞得好的。

灌製音檔也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調查步驟之一。灌製音檔有許多好處：可以帶回研究機關來仔細推敲，又可以請專家來聽聽，核對自己的記錄是否正確。

中國人自己所做的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工作，開始於李方桂所寫的《龍州土語》（1935年調查，1940年出版）和武鳴僮語（1935年調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載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其餘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這兩部書都偏重於語音方面和故事方面，沒有能對少數民族語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話記略》（1943，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導論，第二章是音韻，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沒有涉及語法等方面。李氏在序裏說：“因為這書主要的目的是供給材料，所以比較、歷史、文法上的各種研究都另文討論。”可見他自己也承認這還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曾受過嚴格的語言調查的訓練，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的。

關於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們的音韻和語法，其實音韻也可以歸入語法的範圍。解放以前，依照這個原則去做的，有羅常培的《貢山傣語初探》（1942年鉛印本），馬學良的《撒尼彝語研究》（1946年寫成，1951年出版），高華年的《彝語語法研究》（指納西語，1943年調查，1958年出版），金鵬的《嘉戎語研究》等<sup>⑥</sup>。袁家驊的《阿細民歌及其語言》（1949年油印版，1953年出版），雖然以民歌為主，其中也有一個專章敘述音系與語法。

實驗語音學也可算是屬於描寫語言學的範圍。中國第一個搞實驗語音學的人是劉復。他的《四聲實驗錄》<sup>⑦</sup>講了實驗聲調的方法，講了與聲調有關的樂理<sup>⑧</sup>，記錄了十二種方言（北京、南京、武昌、長沙、成都、福州、廣州、潮州、江陰、江山、旌德、騰越）的聲調。這書在理論方面雖然相當高明，但是在實踐方面做得很差，許多聲調曲線都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如北京的聲調曲線就不應該是那樣）。在調類方面，也有一些錯誤（如長沙平聲有兩種，而說只有一種；廣州入聲有三種，而說只有兩種，甚至說成都的“東”字可以讀成入聲！）劉復作實驗時身在國外，也許由於找不到合適的發音人，以至產生這些缺點<sup>⑨</sup>。他歸國後，在北京大學創立語音樂律實驗室，發明聲調推斷尺，積

⑥ 金鵬的《嘉戎語研究》是用法文寫的，原題 *Etude sur le Jyarung*，載在《漢學》雜誌上。

⑦ 《四聲實驗錄》原由群益書局出版，解放後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版的“內容提要”說：“這是一本否定四聲存在的專著”，這句話是錯誤的，劉復並沒有否定四聲的存在。

⑧ 在樂理方面，劉復講得很透徹。他由於對音樂的愛好（他的兄弟劉天華是一個天才音樂家）講得那樣津津有味，以致有點喧賓奪主，超出了聲調實驗所需要的知識範圍。

⑨ 《四聲實驗錄》原是劉氏在巴黎大學的學位論文。

極提倡實驗語音學。中國實驗語音學是由他建立了一定的基礎的。繼劉氏的《四聲實驗錄》而作的，有王力的《博白方音實驗錄》（法文本1931）。王力利用假顎和浪紋計實驗了博白的元音和輔音，再用浪紋計實驗了博白的聲調。但是他的書影響不大。

描寫語言學在某些方面是接近自然科學的。調查方音需要一雙有訓練的耳朵，如果聽音不準確，記錄的可靠程度就不高。實驗語音學正是調查語言的好工具，但是如果實驗的經驗不豐富，實驗的方法不熟練，仍然是會失敗的。解放以前，中國的描寫語言學並不是十分令人滿意的。但是，由於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人都有很好的語言學修養，劉復則有較好的語音樂律實驗的經驗，描寫語言學可說是有了良好的開端了。

最後，我們在這裏附帶談一談中國解放前的普通語言學。解放前，中國的語言學者對於普通語言學，是通過外文原本來學習的。抗戰時期，西南聯合大學曾經指定Palmer的《語言學引論》作為主要參考書。方光燾、王力、岑麒祥等人曾經在大學裏教過“語言學”，編過講義，但是都沒有寫過書。

沈步洲寫過一部《言語學概論》，質量不高，流傳不廣。倒是胡以魯的《國語學草創》裏面介紹了不少普通語言學的知識<sup>⑩</sup>，可惜譯名過時了，現在的人不容易看懂了。

## 本章的結語

西方的語言學說傳入中國以前，中國的語言學是封建主義的文化；西學東漸以後，直到解放以前，中國的語言學的主流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而屬於封建主義文化的語言學還同時存在着。這兩種文化發生矛盾；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它們是互相排斥的。黃侃為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作贊說：“方今華夏彫瘁，國聞淪失，西來殊學，盪滅舊貫，懷古君子，良用盡(xi)傷！”可見“懷古君子”們是要用“國故”來跟“新學”對抗的。在最初的時候，也曾經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階段，或者稱為“中西合璧”的階段”。例如馬建忠在《馬氏文通》裏引《說文》：“會，詞之舒也<sup>⑪</sup>”《孝經·天子章·正義》：“蓋，辜較之辭<sup>⑫</sup>”，《論語·公冶長·正義》：“弗者，不之深也”<sup>⑬</sup>，又在講句讀時把中國傳統的句讀與西洋語法的句讀融為一爐<sup>⑭</sup>。又如楊樹達《高等國文法》的“總論”中大講其“古代之文法學”<sup>⑮</sup>。胡以魯在他的《國語學草創》中，一方面介紹西方的語言學說，另一方面也介紹了他的老師章炳麟的語言學。但是，“中西合璧”是做不好的，正如劉復所嘲笑的“風琴與洞簫合奏”一樣，顯得十分不和諧。後來楊

⑩ 胡以魯是章炳麟的弟子，留學日本。

⑪ 《馬氏文通》，校注本，310頁。

⑫ 同上，358頁。

⑬ 同上，306頁。

⑭ 參看何容：《中國文法論》170—182頁

⑮ 《高等國文法》，13—23頁。

樹達索性繼承乾嘉學派的事業，去搞他的“小學”去了。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人搞古音擬測，搞方言調查，與章、黃一派分道揚鑣，幾乎可以說是“井水不犯河水。”直到1947年，王力發表了他的《新訓詁學》<sup>⑭</sup>，其中講了“舊訓詁學的總清算”；提出了“新訓詁學”，才算跟舊派宣告了決裂。

新派也有自己的弱點。在“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的時候，小學家幾乎都是經學家，個個博聞強記，於學無所不窺。顧江戴段和王氏父子自然不消說了，即以章炳麟、黃侃而論，其中國史料知識淵博，遠非新派所能望其項背。在封建時代，並沒有所謂專門家，有的只是“博學鴻詞”，所以著名學者的學問都是全面的。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上卷論小學，中卷論文學，下卷論諸子學，實際上是一身而兼語言學家、文學批評家、哲學家。黃侃寫了《音略》，同時也寫了很有價值的《文心雕龍札記》<sup>⑮</sup>。王國維在學術上和章黃是不同道的，但是有一點却是相同，那就是博通小學、文學批評、史學和哲學。新派的語言學者一般總是把自己局限在狹小的範圍之內。資產階級提倡學術分工，本來也有它的進步性，但是必須先博而後能專。曾經有一個時期，似乎所謂語言學只有方言調查，或者再加上古音擬測，不但把中國傳統的“小學”置於不顧，連現代語言學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談不上淵博了。

但是，總的來看，這一個時期的中國語言學是向前發展了的。語言學者受過現代科學的訓練，有了比較清醒的科學頭腦，懂得科學地分析問題，不至犯邏輯上的明顯錯誤，這些都是遠勝前人的地方。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得到了中國語言學退步的結論，那也是不合乎事實的。

### 全書的結論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路線，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第一個因素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第二個因素是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

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爲了實用的目的的。這與經濟基礎不是直接的關係，而是間接的關係。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過程中，“先王之道”被認爲是鞏固封建統治的法寶。即使是提倡變法的王安石，也主張“當法其意”（《上仁宗皇帝書》）。要法其意，也就必須通經，通經必先識字；識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過這個手段不能達到通經的目的，也就無從確知“先王之道。”張之洞說：“治經貴通大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sup>⑯</sup>這種指導思想貫串

<sup>⑭</sup> 王力：《新訓詁學》。見《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第173—188面。後來收入《漢語史論文集》（277—289頁）。

<sup>⑮</sup>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1927年北京文化學社發行，已絕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多處引此書。

<sup>⑯</sup> 張之洞：《說文解字義證序》。

着將近二千年的中國語言學。

在五四運動以前，沒有產生描寫語言學，因為在復古主義作為主流的時代裡；當代語言的靜態描寫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實際上搞一些當代音系的概述的人也不承認那是與古違異的東西，例如修訂《五方元音》的年希堯在序文中先斥“沈韻”為“囿於一方之音”，然後稱該書為“五方”的“元音”（正音），可見他並不承認是一種靜態的描寫。正是由於這種思想的指導，使《切韻》的作者不敢以一時一地之音的面貌出現。《中原音韻》是作為曲韻出現，而不是作為語言學的書籍出現的。鼎鼎大名的清儒所著的語言學傑作，沒有一部不是為經學服務的，與描寫語言學正是背道而馳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歷史語言學。搞古代語言不一定就是搞歷史。小學家把古代語言（主要是先秦語言）放在一個平面上研究，忽視了它的歷史發展。段玉裁偶然講一講古今詞義的異同，已經是鳳毛麟角，他沒有系統地講語言的發展規律，也夠不上稱為歷史語言學。音韻方面，自清儒以後，歷史觀念是比較清楚的。但是清儒排斥今音，崇尚古音，仍然不是進行語音史的研究。直到馬建忠，他仍然沒有發展觀點，他把韓愈和司馬遷、班固排在一起，他說：“為文之道，古人遠勝今人，則時運升降為之也”；又說：“諸所引書，實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證為法。其不如法者，則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sup>①</sup> 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意思是說語法是一種千古不變的規範，合乎古者則合法，不合乎古者則非法。五四以後，中國人知道了歷史語言學，高本漢在歷史語言學上給我們一些好的影響。王力寫了《理想的字典》一文<sup>②</sup>，其中提出歷史字典的主張，並且在他的《中國語法理論》裡常常談到語法的變遷。但是，直到解放以前，還不能產生一部漢語史。原因很簡單：二千年來不曾關心的事情，一天晚上是趕不出來的。

在五四運動以前，也沒有產生語言理論。像《荀子·正名篇》那樣透闢的語言理論，後世沒有嗣響。《釋名》的作者也算追求語言理論，但是沒有成功。宋邵雍《皇極經世》所載的《天聲地音》，看標題好像要講一些什麼秘密；其實是很不精明的聲母韻母配合表。江永《音學辨微》第十辨無字之音，第十一辨嬰兒之音，第十二論圖書（指河圖洛書）為聲音之源。除第十二條是牽強附會外，第十條和第十一條本來屬於語言理論範圍，但是江氏談得都不好。王念孫“就古音求古義，不限形體”是一個很好的語言理論，可惜沒有專文發揮。章炳麟《國故論衡》有《音理論》和《語言緣起說》，題目非常吸引人，然而《音理論》無非重複江永三十六母可以“補苴”為五十母的論調。重複明人二呼不能有八等的論調，等等，殊無可取；《語言緣起說》雖有個別地方可取（如言名詞先於動詞），但是雜以聲訓之說，亦多唯心之論。總之，中國語言學既為經學的附庸，識字是不需要很多的語言理論的，所以沒有朝這一方面發展。

<sup>①</sup> 見《馬氏文通》例言。校注本上冊第9—10頁。

<sup>②</sup> 王力《理想的字典》，見《國文月刊》33期（1945）2—27頁，又《中國語文研究參考資料選輯》（1955），236—271頁。

漢族語言文字本身的特點規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不以語法為對象，而以文字為對象。其所以不以語法為對象，因為漢語的語法是比較簡單的<sup>①</sup>。虛詞可以作為詞匯的問題來解決；句法則古今的差別不大，古代漢語句法問題可以通過熟讀領悟來解決。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梵語音韻曾經影響我國的音韻學，而梵語語法却沒有促使漢語語法學的產生；又說明了為什麼直到十九世紀末年，馬建忠才從西方移植了“葛郎瑪”。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這樣的印象，以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的研究，與通經直接發生關係。古人錯誤地以為：音讀和訓詁都是從文字生出來的；研究了文字，音讀和訓詁也跟着解決了（所以張之洞說：“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這說明了為什麼二千年中，《說文》始終處於“小學”的統治地位。文字的價值的超估，直到民國初年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舉例來說，章炳麟作《文學總畧》還斤斤於“文”、“衫”之辨，以為“凡衫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衫。”<sup>②</sup>在西洋，語言學與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國古代，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原因就在於此。

我們把中國語言學分為四個時期，其中只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漢代到1898年這是封建主義文化的階段。蘇聯語言學家有所謂“科學前”的語言學，“科學前”這個提法是否妥當，可以再仔細斟酌，但是這個階段和後一階段的界限是那樣黑白分明，至少可以說在學術觀點方法是迥然不同的。第二階段從1899年到1949年，這是資本主義文化的階段。這五十年間，中國語言學的主流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學。

按四個時期來說，第一個時期是經學時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以疏解經義為目的，最重點的兩部著作——《爾雅》、《說文》——都被認為是羽翼六經的。第二個時期是佛學與理學時期，在這一個時期，經義雖也還算重要，但主要不在於字義的辨析，而在於章句的闡述，於是語言學的重點轉移到音韻學上，以與文學上的聲律、哲學上的佛教相配合。第三個時期是經學復興時期，經學家們遙承“漢學”，作風與“宋學”迥然不同。這時去古已遠，需要考證的東西很多，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學”碩果纍纍；到了清末以後也可以說“去古更速”，因為有了甲骨的出土，銅器的增加，我們有條件認識漢人所未識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比漢人多了解遠古的語言。第四個時期是西學東漸時期，這個時期如上所說，是以資產階級語言學為主流，語言學的領域擴大了，方法改進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們看見，從第二個時期起，每一個時期都克服了前期的某些缺點，把中國語言學推進了一步。在第一時期，漢儒對於音節還不能分析為音素；到了第二時期，韻圖中不但有了聲母、韻母之分；連韻頭、韻尾也在“等”與“攝”中分析出來了。第一、二兩期都沒有離開實踐語言學的性質，語言學的著作一般都很像課本，學術研究性不強。到了第三期的清儒手裡，才真正搞起科學研究來了，具體表現在搜集和鑑別材料，充分掌握材料，用觀點來處理材料，得出一些科學的結論，發前人所未發。可惜有些觀點是錯

<sup>①</sup> 我們不能以語法的複雜和簡單來判定語言的優劣，正如不能以多音節和單音節來判定語言的優劣一樣。

<sup>②</sup> 《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中》，53頁。



誤的，最突出的是從打破文字的束縛走到另一個極端，輕視文字的社會性，常常任意歪曲文字所表達的概念，來迎合自己的主觀臆斷。到了第四個時期，中國語言學吸收了西方語言學的優點，把這一門科學現代化了，使它有了嶄新的面貌。但是，應當指出，當我們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時，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難免同時承受了它的糟粕和毒素。最明顯的事例就是高本漢用他的主觀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去觀察材料，用他的實用主義方法來引導我們去處理材料，使我們在科學研究中常常得不出可靠的結論。理論脫離實踐，是資產階級學術的特點，解放前的五十年中，語言學界對語文教育不關心，與封建時代的“小學”為語文教育服務對比起來，反而遜色。

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語言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首先是語言學的隊伍擴大了。有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中國語言學不至於迷失方向。新中國的語言學是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目的明確了，科學研究就不至於脫離實際。現在已經獲得的主要成績是：簡化漢字，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並為少數民族制定或修訂了拼音文字；語法知識深入到學校中去，語法研究也逐漸在廣大語言學界中展開，比解放前更能注重漢語特點，特別是注意語音和語法的聯繫；漢語方言調查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有一躍千里之勢，已經有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論文<sup>②</sup>。漢語史和語言理論方面也發表了一些論文或專著了。

瞻望前途，有這樣一些遠景：（一）在充分研究了中國的漢語及少數民族語言之後，結合着已有的普通語言學知識，概括了語言的發展規律，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有創造性的語言學理論。（二）在上述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下，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以及中國各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法體系。（三）寫出一部高質量的漢語史。（四）編出一部歷史性的漢語大詞典。（五）總結前人研究《說文》的成果，寫出一部“新說文解字”。（六）繪出全國方言地圖。（七）用最先進的方法進行語音實驗。（八）發展現代實用語言學，如機器翻譯漢字信息工程等。其他還有許多研究工作，全國語言學工作者都會協調地努力完成。到那個時節，中國將成為科學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中國語言學亦將在世界語言學中居於先進的地位。

② 例如《中國語文》1962年5月號所載馬學良、喻世長的《我國漢藏語系語言元音的長短》。

參考資料：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

趙元任：《鍾祥方言記》。

趙元任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卷二。

馬學良：《撒尼彝語研究》。